我们的创新能否经受住时间和地域的考验,仍需考察;我们创新之路,仍需鉴别、厘清;我们要创造出世界文明意义下的创新成就,还需向西方学习。

论创新力

■盛新庆

创新对一个人、一个企业、一所学校、一个民族都是极其重要的,这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6月9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两院大会上,更是明确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近代以来,世界文明普遍意义下的创新成就,我们贡献的还很少。我们的创新能否经受住时间和地域的考验,仍需考察;我们创新之路,仍需鉴别、厘清;我们要创造出世界文明意义下的创新成就,还需向西方学习。

实际上,清朝末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借鉴。但是,百年过去了,在做出世界文明普遍意义下的创新成就方面,仍未有大的改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只学其看上去有用的,或者说只学其形式,没有融汇其精神、思想、价值观。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这种学习心态的一个集中体现。

本质上说,一个民族的创新之路,取得怎样的创新成就,是由其核心价值观与支撑价值观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决定的。价值取向不同,思想源流不同,做同样的事,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没有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突破,没有一批新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坚定信仰者,事情是很难成功的。目前对理论认识模糊、不重视理论构建、淡化理论指导,甚至做事不讲理论、只重实效、只重抓到老鼠等风气,都是诱发“后发劣势”的潜在因素。以科教为例,如果我们的终极关怀是从过去不重视指标,到只重视各种指标:项目数、论文数、专利数、获奖数,以及据此来排定次序,而忽视对客观世界本体的用心追求,恐怕就极有可能是“后发劣势”。

因此,要提高我们中华民族西方意义下的创新力,需要首先在价值、思想、精神方面借鉴、吸收西方。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上的讲话,更是明确指出“关键在于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成效对比,充分说明这种学习态度的可贵。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其思想和价值观念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彻底抛弃本民族思想和价值观念,不仅无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抱着彻底西化的态度,只能使本民族思想混乱,加剧思想和现实的脱节。历史上,华夏文化曾面临过多次外来文化的挑战,最终都能吸收、融合对方思想文化体系,提出了新的有特质的思想文化体系,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发展。

上述所讲是一个学习立场、态度的问题,虽极其重要,但仍然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要真正解决好此问题,仍需长期探索。清朝末年以来,面临西方思想文化的严峻挑战,我们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总体上似乎仍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层面,新的思想与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或者说构建得还不够清晰、具体、有力、宏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实事求是是其精髓之一。文革后期,谁在实事求是,怎么才算实事求是,界限较为分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成效巨大。但是,面对变幻莫测的新世纪,怎样才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尤其是怎样才能从感情上乐于实事求是?而不是一切从协调平衡人事关系出发,仍然是未解的、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的大理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我们民族绵延几千年文化所塑造起来的根本特性作更为深入的研究,甚至要进入对中华民族潜意识的研究;需要对西方优秀文化支撑下的价值观的充分消化和吸收;需要利用新思维、新技术打破现有的人事垄断结构和固化的办事潜操作流程;需要对我们民族灵魂深处价值体系的重新构建,尤其是要建立起“真理第一性,人间秩序第二性”的信仰、理论、制度与社会风气。构建新时代下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思想和价值新体系,仍然任重道远。

一个民族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演变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更不可能等思想和观念完全到位了,再去做事。这正是目前建设、改革的难点。最近,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出版了一本专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重构了轴心时代华夏民族古代思想的演变过程,很值得一读。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往往来源于实践,尤其来自于对成功实践案例的总结。礼乐传统,这个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便是来自周文王对殷衰周盛过程的总结,尤其是对“牧野之战”深刻总结的结果。没有成功案例支撑的思想与价值体系只是乌托邦,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有生命力。成功的改革范例是民族思想和价值观念漫长演变历史进程中的关键点。

回顾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首先是抓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上的突破点,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紧跟着是安排一批这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坚定信仰者,去领导建立一系列特区,去具体落实这一思想,然后从特区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推广至全国,最终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深入人心,使“两个凡是”彻底失去市场。在我看来,建立特区也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之一,是将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方法,是新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系还未构建成熟、还不够具体、还不够统一的情况下,从事建设、改革的最为有效方法之一。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好的改革理念、设想,因为开始之初不成熟、不具体、人力不够、没人理解、或人为干扰等原因,被世俗扼杀在摇篮中。先进的改革理念和设想,没有一批思想和价值观念一致,拥有激情的人推进,没有完整配套的政策、资源支持,不能全神贯注,弱小的幼苗只能随波逐流或者消失殆尽。改革不是旧政治格局下的协调和平衡,是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建立特区能使人才汇聚、精神贯注、资源集中,是搞成改革成功典范不可缺少的方法,是落实理念的强力推进剂。尽管我们已在各领域不自觉地应用了这一方法,但我们仍需要更深入挖掘、研究、总结特区方法,自觉地在各自领域应用此方法。建成特区当然也并非易事,但总体而言,特区由于规模小、更易驾驭、更易排除干扰、更易集中精力,更易成功。这些特区将是落实总体改革设想的排头兵。特区使理念与设想更为具体、清晰。没有这些排头兵,理念与各种设计的落实就很有可能流于形式、换汤不换药或者彻底走形甚至走向设想的反面。破易立难!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人才素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教育体系。在2010夏季达沃斯“全球经济展望”分论坛上,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表示:“很久都不会出现中国的苹果、中国的谷歌,至少五十年到一百年不会这样,中国想要这样做的话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系。”无法预知未来是否会像李开复所说的那样,但是我们的教育体系确实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存在一系列问题。要全面系统改革极其困难,不妨利用建立各种特区,先做探索。

一个人创新能力的培养越早越好。杰出人才虽然其代表性创新成果往往都是成年以后取得的,但是他们创新能力的培养却开始得很早。不难推知,一个人越早接触创新活动,其创新活动的涉猎面就越广,其创新经验的积累也就越多,做出大的创新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一个人创新能力的培养在研究生阶段才开始,那么创新就极有可能局限在很窄的专业,很难作出跨领域、跨行业的创新成果,而大成就、划时代进步往往是在跨领域、跨行业产生的。

发达国家很多精英培养计划,都是从中小学就开始。目前,我国中小学,甚至到大学本科,开展的教育基本都是知识教育,很少有创新能力培养。很多中小学已意识到此问题,注意创新能力培养,但实施很不到位,在现有教育资源下也不可能到位。能否做到创新能力培养,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教师在培养学生。一个从未进行或很少进行创新研究的教师,是很难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因为其本人对创新过程的本体知之甚少。不论其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还是启发性教学、研究型课程等名号,其传授的只能是知识,或者说是伪创新能力,误把课外知识或技能训练当作创新能力培养。因此如何吸引一批有创新能力的学者,投入精力从事中小学、大学本科的学生培养工作是改革我国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关键。

基于此,国家是否可以通过建立特区,探索构建一些现代书院,号召、吸引、资助一批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大学学者,联合中小学,并通过多渠道融资,融合大、中、小学校的教育资源,开展创新能力的早期培养。这些书院的现代性在于不仅传授一些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建立中小学学生与大学一流学者常态化交流的平台,使拔尖人才尽早被发现,创新能力在中小学阶段就得以培养,进而逐步改变、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系。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面对需要铭记的历史,我们是否该告诉国民,以建筑的名义瞻仰纪念遗迹是感受抗战史诗的绝好方式,如此这般我们会发现身边更多的纪念空间。

用事件建筑纪念一个民族的抗战史

■金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公布2014年9月3日为首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12月13日为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面对需要铭记的历史,我们是否该告诉国民,以建筑的名义瞻仰纪念遗迹是感受抗战史诗的绝好方式,如此这般我们会发现身边更多的纪念空间。

用事件建筑来纪念一个民族的抗战,是一种智慧的选择;记载下经典战役后面的英烈面孔不仅是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展现,更体现民族精神“肌肤”的特殊光彩。抗战,值得国人肯定的精神和思想到底是什么,这尽管该是史学家、文学家回答的问题,但历史与建筑上留下的斑驳影像让不容置疑的真相扑面而来,竖起了纪念碑。

事件建筑对于纪念抗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它可以让许多人摆脱现有的生活工作轨迹,抬头凝望星空,再埋头阅读思考,他们会从那些记载着抗战事件的建筑空间与遗址中找到自己的路程和想要说的话。

事件建筑的纪念功能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

(1)集体记忆。抗战纪念建筑的全部意义,是通过空间形式负载的二战历史与文化内涵,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并通过事件的追溯再现“抗战”场景达到纪念之目的。这种纪念功能是一个“集体回忆”,是依靠社会记忆之框架来构建精神记忆,从而借助现在,重构了过去的岁月。

(2)教化功能。抗战事件纪念,无论从传承主流价值观,还是对重要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梳理,都在营造全民族的认同性,普惠公众,尤其要从中小学生的教化入手。

(3)纪念的传播。事件建筑的传播是纪念空间记忆与教化功能实现的关键环节,要创造并形成一个传播的辐射—接受—反馈的纪念空间教育过程。

作为一种建言,我以为当下最不该回避的是作为警示性文化遗产的抗战建筑文化遗产研究与发掘,在我们这个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城市化膨胀的国度,难道不该以尊重民族之心启动这警示性文化遗产的建设吗?

纵览中国抗战纪念建筑展现给今人的方方面面,我们至少会有如下缅述和顿悟,它确能留给人们一系列思考:其一,抗战纪念建筑是文化中国的行进记忆,它在用建筑、遗址、遗迹见证惨烈抗战史实时,彰显了当代中国伟大复兴的使命;其二,缅述或考察这些或更多的抗战纪念建筑,完全契合世界反法西斯的主题,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中国对纪念遗产的敬畏与尊重;其三,我国抗战建筑遗产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并向世界展示,尤其该告别学术化、博览化做法,建议要为中小学生乃至公民推出《抗战纪念建筑教育读本》,在普及抗战建筑英烈事迹及经典战役时,宣传特定含义下的抗战建筑纪念文化。

历史好似一个个重放的镜头,转眼之间,双甲子轮回,中日关系再次面临困境。我们带着灵魂深处最痛楚的记忆,想到120年前日本偷袭中国运兵船挑起甲午海战,我们更想到岂止甲午,从“一战”到“二战”,历史都是教科书和清醒剂。如果说“一战”是德、日在中国领土上争夺殖民利益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那么“二战”更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向世界人民的宣战,日本侵略者为自己掘好了墓,华夏民族以英勇反抗为自己树立了丰碑。所以用建筑的名义传承抗战历史,是个兼顾历史性、文化性、建筑性、教育性的鸿篇巨制,具有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与历史政治价值,是需要不断挖掘并肩负责任的,更建议它应该成为国家重大历史文化教育题材,并纳入“国家纪念遗产教育工程”中,使之在现有研究和传播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建筑遗产的“中国范本”。据此,国人不仅应开辟“抗战纪念建筑”专线教育游,一定要精心设计使之成为生动且鲜明的抗战教育遗产地和“大课堂”。

(作者系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总编辑)

纪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法治反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反腐败。这里的法治不仅仅是具体的法律法规,而是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

法治反腐势在必行

■庄德水

今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先行改革,调整内设机构,6个部门被整合,增设2个纪检监察室,1个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将参加的125个议事协调机构清理调整至14个,更加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强化执纪监督职责,提高履职能力。执纪监督室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核心,只有执纪监督到位,才能明确职能定位。要围绕“职能”重新界定纪检组织的工作范围,明确工作方式,从包打天下到术业有专攻,避免造成“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的尴尬局面。

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功能来区分不同性质的权力,同时又要求其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是我们党在科学配置权力方面的一种创新。要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要求,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解决某些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以及执行不力等问题。要按照“权责一致、规范有序、相互协调、运行顺畅”的要求,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按照分工负责原则确定主要领导干部分管的事项、掌握的权力以及应负的责任,形成领导班子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配合的权力运行体系。

纪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法治反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反腐败。这里的法治不仅仅是具体的法律法规,而是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反腐败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认同法治精神,即认同其所蕴含的民主权利、权力制约和公平正义,让这些基本价值成为反腐败的本质追求。提倡依法治国,必须把法治反腐融入国家治理过程,依靠法治手段解决腐败问题。

从党的十四大至今,是纪检工作逐步法治化发展时期。在此阶段,我国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反腐倡廉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腐败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十五大以后,反腐倡廉方略进一步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面发展。党的十七大以来,反腐倡廉方略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与此相适应,廉政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即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实现以法导廉、依法治腐、依法防腐。

客观地说,当前廉政法制建设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立法主要出于政策规定层面,原则性强于权威性;各项具体法制之间缺乏关联性,有些法制缺乏配套措施和程序性规定,操作性有限;法制规范性不足,一些规定无章可循,存在执行盲区;个别工作领域的法制执行过程仍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等现象。更重要的是,我国仍缺乏一个国家反腐败总法,难以对我国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基本内容、管理机构、职责权限、责任追究、法律衔接及适用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当前,要根据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以及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廉政法制建设的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类法制、违纪惩戒法制、纪检工作程序类法制,形成一个类别较为完善、功能较为全面的廉政法律体系。另外,要注意解决廉政立法的统一性问题,对我国现有的廉政法制和党内法规进行清理,对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要予以废止,对过时的要进行修订和补充,逐步形成协调统一的廉政法制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借鉴国际经验,完善预防性廉政法制体系,比如尽快制定《公务员伦理法》《防止利益冲突法》及《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把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从政要求法制化。

法治反腐需要克服三方面的阻力:一是传统人治观念的影响,这是思想阻力;二是部门利益的牵制,这是利益阻力;三是权贵阶层的抵制,这是政治阻力,也是当前最大的阻力。能不能克服这三个方面的阻力,直接关系到廉政立法的成败与否。可以说,法治反腐不能局限于廉政领域,仅仅依靠立法机关的力量,就立法谈立法,是难以实现廉政立法预定目标的。法治反腐需要科学设计和宏观协调,更需要政治保证和社会参与。法治反腐是一项系统工程,立法只是法治反腐的基础性内容,有两方面的内容不容忽视,一是相关反腐败法律的配套措施,要根据立法原则和要求,对相关廉政法律的核心内容加以细化,建立健全其保障机制、司法程序和问责程序;二是相关廉政法律的执行机制。“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要提升相关廉政法律的权威性,形成尊重法律的社会氛围;要保证相关廉政法律的强制性,违法必究,形成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

(作者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时事漫话

重奖办不出好教育

■沙森

近日,有媒体报道,广东恩平为扭转优质生源流失的现状,重振恩平教育事业,由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回乡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用于奖励2015年至2021年间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考生及相关教职人员。考上清华北大的广东恩平考生不仅可以获100万元奖金,还可获赠洋房一套。此外,恩平官方也设立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每年有600万元专款对办学业绩突出、绩效考核优秀的学校进行奖励。

重奖考上北大清华的学子,按照恩平当地的说法,是为营造重视教育的氛围,引起大家对教育的重视,扭转优质生源流失,重振恩平教育事业。

捐赠者的初衷当然是好的,可是靠重奖真能办出好教育吗?

教育的本质是将人培养为一个完善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学历教育只是教育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而高考又只是学历教育的一个阶段。将重奖考上清华、北大的学子与振兴教育联系起来,恐有有违逻辑之嫌。

况且,从人终身发展的角度来看,由内在动力驱动的学习动机最能持久,也最能发挥出其潜力。靠物质重奖激励学生的学习,无疑是在物化、异化学生们对待学习的动机。从短期来看,这种物质刺激可能会带来优质生源回流、学校和教师加大投入、学生考取名校动力更足等“正面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高考制度不完善、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缓慢等制度性问题不解决,仅仅依靠物质奖励提高一个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无异于扬汤止沸。

我国有重视考试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影响着许多地区的教育观念。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高考的过分拔高和重视,以至于将考上清华、北大人数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地方教育水平的重要尺度。教育不是少数人的教育,而能上清华北大的毕竟只是少数人。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地方考上清华北大的人多就说这个地方的教育是成功的,反之亦然。

捐赠者和地方政府的心愿是好的,可是方法有问题。如果能将这笔钱切切实实地用在平衡当地教育资源的投入上,使每一个当地的孩子都能从中受益,对于教育本身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翟小云供图